

李庆甲先生（1933—1985）逝世已经33年，一直想写些文字，又不知从何写起。从师承来说，他是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的在职研究生，于我为师兄；我读研时，他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总支副书记，虽未听过他的课，却属师生。我留系工作，与他在同一教研室，同事了三四年。那几年他辞掉党务，专心学术，出了几种古籍整理的专著，据说仅《词综》一书就得到稿费7000元，那时可是天文数字。好几次，他向我表示，如果生活有什么困难，包括借钱，尽可告他，他一定帮忙，令我很感动。与他接触较多，则是1984年11月协助他处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会务，前后大约有三四个月时间。

《文心雕龙》是南朝齐梁间伟大学者刘勰的著作，以50篇来讨论文学的分类、写作、批评及主导思想，用骈文写成，体系博大精深，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空前著作，当然也引起中日学者共同的兴趣。复旦大学是国内文学批评史学科公认的重镇，该学科三位奠基学者，两位在复旦，即郭绍虞先生与朱东润先生。后起的刘大杰先生与王运熙先生也有卓越建树。

此次会议的发起过程我不甚清楚，能看到的是由王元化先生与王运熙先生领衔召集，由章培恒先生负责约请日本学者，由李庆甲先生负责具体会务组织。元化先生那年刚从市委宣传部部长退下来，资源丰沛。会议安排在当时刚建成不久的龙柏饭店举办，那时星级酒店的住宿远非一般大学教师可想象，没有有力者的支持，很难办到。章培恒先生于1978年至1979年任教神户大学，他的学识为日本汉文学界广泛称道，人脉丰富。与他同年的庆甲先生出道稍晚，专治《文心雕龙》，由他操劳会务，各方都信任。我那时刚完成1984届本科生的分配，稍得余裕，庆甲先生约我负责会间的文件秘书事务，接待会务则由那

濠上漫与

随李庆甲先生办会

■陈尚君



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期间合影，（左起）杨明照、徐中玉、钱伯城、钱仲联、吴调公、李庆甲、王运熙、王元化、牟世金。钱仲联保存，罗时进提供。

时还是他研究生的汪涌豪负责。

庆甲先生做事极其仔细认真，凡事都想得复杂，交待仔细。甚至有些我只需做半小时的事，他会反复交待两个小时，我只要按他的思路做就可以，根本不需我费心思。现在回忆，甚至想不出有我任何遇到困难不知如何办，或会间出现重大失误的过失。我能记住的，是庆甲先生每天做什么事都会告诉我。比如准备给中日学者的礼物，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文心雕龙》最好版本元延佑刊本，前言由庆甲先生执笔，出版时署元化先生名，元化先生后来为庆甲先生遗著《文心拾隅集》写序时也说到，我当时就知道了；中日学者如何住宿（日本学者一人一室，中国学者两人一室），如何接站，如何安排会议程序，都让他费尽心力；会议期间有三次宴请，两公一私，规格都是四桌，每次都有十多人无法受邀，庆甲先生又不希望冷

落任何一位客人，他告我曾连续用几个晚上安排就餐名单，仍觉摆不平；因为中日学者地位崇高，会议论文都用中日两种文字印出，也很费周章。

这次会议，中日双方都有大批地位和年资很高的学者参加。手边有1985年第二期《中华文史论丛》所刊日本学者11人的名单，他们是九州大学目加田诚、武库川女子大学小尾郊一、神户大学伊藤正文、立正大学户田浩晓、广岛大学古田敬一、九州大学冈村繁、东京大学竹田晃、爱知县立大学坂田新、四国女子大学安东谅、京都大学兴膳宏。其中目加田教授任团长，年已八十，其次小尾教授年七十二，其他各位大多年过六十，最年轻的兴膳宏教授年四十八。那时中日学界交往很少，日本学者更礼数森严，不易接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离开住处赴会场，日本学者都在电梯入口前排起方阵，最年长的目加田

和小尾居前，后面九人三三方阵，人隔一米，整齐行动。这种阵势，以前没见过，以后也没见。

海外华人学者仅请了香港饶宗颐先生。那时两岸还未开禁，交流更谈不上。会间，我有幸陪饶先生往宛平南路看望王遽常先生。两位前辈见面后，反复拱手作揖，互道契阔。后来方知，两位曾是无锡国专时的同事，至少有35年未见了。

大陆学者约有30多位，记得有苏州大学钱仲联、四川大学杨明照、华东师大徐中玉、安徽师大祖保泉、西北师大郭晋稀、山东大学牟世金、南京师大吴调公等，也极一时之选。我因负责会议文秘，听完会议的全过程，领略各位名家的风采，也感受大家与乡愿治学取径之不同。比如刚讨论宋人為何不看重《文心雕龙》时，有某翁起而反驳：宋人许多类书都有引用，哪能说不重视？众人哑然，换其他话题了。我仅管会务，谨守

分际，很少找人请教，特殊的是某公首次认识，主动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留下一生恩怨。

会间组织中日学者参观复旦大学，一些学者还专程看望朱东润先生。复旦诸先生协同办会，总体组织得很好。元化先生还安排参访青浦淀山湖。唯有一件小事，有些让我意外。

章培恒先生个人宴请中日学者，即将开始，还不见庆甲先生来，他遂与我一起到住处邀请。庆甲先生在内洗澡，我告知原委，他在内大声说：“他又没有请我，我怎么去啊？”章先生掉头就走。我事后问过章先生，告曾当面邀请，因为同事加朋友，因而没写请柬，引起意外。庆甲先生病重后，章先生主持系职称晋升，涉及庆甲先生部分，全力维持，看来他们事后有过沟通。从此我深悟，人际讲究礼数之必要。

庆甲先生早年任系团总支书记，在轰轰烈烈中当然相信一切，有对老师失敬处。乱后主动向朱先生道歉，得到原谅。辞去系务后，他觉以往损失太多，全力学术，四五年间出版了《楚辞补注》与《词综》两书，完成《瀛奎律髓汇评》的整理（身后出版），又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办会加搬家装修的持续劳累，使他病倒，很快查出是癌症，去世时仅52岁。他病重期间，我曾多次听朱先生回忆往事，说到庆甲刚到复旦时，是一个很朴素单纯的农村孩子，居然很快要死了，真的非常难过。庆甲先生弥留之际，我因任校文史学科组秘书，旁听了庆甲先生是否晋升教授的全程讨论。朱先生说：“庆甲做的《刘勰卒年考》，意义很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写了。”爱惜之情，溢于言表。稍前陪王运熙先生去扬州，说到庆甲先生的学问：“他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庆甲先生逝世后，王运熙先生为他整理遗稿，由元化先生作序出版，仅不厚的一册。

蒋廷黻论林则徐与琦善

■丁辉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外交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

蒋廷黻1912年赴美留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高足、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 Hayes)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1923年归国，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当日所提携、培养的弟子，有许多后来术业有专攻，成名成家，如费正清、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姚薇元、吴相湘等。

1935年，蒋廷黻走上政坛。此后，除1938年在汉口短暂赋闲时期撰写了《中国近代史》，直至临终，再没有返回他心爱的学术园地。

黄仁宇尝言，治史须“放宽历史的视界”。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当得此语。开篇“剿夷与抚夷”章言：“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言外之意，呼之



蒋廷黻

欲出：战败者是不可能获得平等待遇的。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偃见英国使臣的朗声言辞已然埋下半个多世纪后大清走向衰亡最初的种子。

蒋氏论林则徐，尤中肯綮。有两个林则徐，一是士大夫眼中的林则徐，一是真实的林则徐。士大夫眼中的林则徐，百战百胜，洋人闻其名而丧胆，惜奸臣琦善收受英人贿赂，致林去职，局面遂不可收拾。其实，

真实的林则徐彼时已然觉悟：我方军器、实力皆远逊于西。他竭力买外国炮、外国船，且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他在广东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后来都给了魏默深（源），魏氏据之撰成《海国图志》。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并不为过。

林则徐的软肋是过于顾惜“羽毛”，为“士林清誉”而惧受“清议”指摘，无勇气登高一呼而醒世人。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万众景仰，然林氏终受声名所累！

若言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则可谓琦善为近代中国“努力外交”之第一人。当然，此亦需放宽历史视界而检讨之。琦善之“奸臣误国”，受英人贿赂而撤防、主和以致败，不独鸦片战争初

息便为朝野共认，且主导了之后百余年的主流“历史”。至今学校历史课讲述鸦片战争时仍常见师生斥骂琦善之痛恨加鄙夷表情。其实，琦善之种种罪状纯出朝中“清议”的构陷，蒋氏在其书中为琦善辩诬，考之甚详。

琦善系林则徐继任，对中英之战诚然悲观，但此“悲观”是其识见“超人”之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蒋氏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宋以降，主战、主和的朝议之争，由于受制于泛道德主义思维，遂有了忠奸顺逆的道德色彩。主战即为忠臣，主和即为奸逆。其实，战争的发动与否（“打”还是“不打”）不可仅凭意气，无论这意气是否多高尚，而应凭对战争双方形势的审察及对战争的成本与收益的核算。

时论指责琦善“奸臣误国”的背后是不认输、不服输之虚骄，既然如此，当然谈不上知不足而谋自强。因此，晚清的自强运动并非始自鸦片战争受挫于英，而是始自2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受挫于英、法。由此，蒋氏认为，“虚骄自大”使得中华民族白白“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